

4/1982

上海青
运史
资料

SHANGHAI
QING YUNSHI
ZI LIAO



对团员青年进行“三热爱”教育的
一本好的辅导读物

《春天的摇篮》出版

共青团上海市委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本书定价：0.72元

订购办法：团组织可直接向上海各区（县）新华书店发行组购买。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本书 320 页共集有解放战争时期上海青年运动回忆录 29 篇和 4 篇上海青年烈士小传，形象而生动地叙述和描绘了上海青年在白色恐怖的“寒冬”里，为迎接明媚的“春天”，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

上海青运史资料

编辑

印刷

一九八二年第四辑（总第四辑）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组

（上海江西中路 200 号）

常熟教育印刷厂

（内部读物）

上海青运史资料

目 录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总第四辑)

1982.10.30出版

专 文

寄语工人阶级新一代……………张 祺 (1)

专题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学生运动
……………任建树 (6)

人物介绍

忆秦鸿钧烈士……………韩慧如 (12)

欧阳立安……………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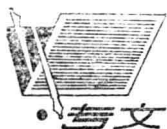
梁仁达与“二·九”惨案…………… (26)

回 忆 录

涓涓细水汇巨流

——忆省上中从分散小型的抗日社团活动到声
势浩大的反汪斗争……………潘文铮 (30)

公祭于再……………缪 鹏 (39)



寄语工人阶级新一代

中共上海 张 祺
市委顾问

《上海青运史资料》编辑同志要我向青年说些话。我认为应当对青年补上新旧社会对比和工人阶级英勇斗争历史这一课。在旧社会，我是个普通工人，就从我的亲身经历谈起吧。

三十年代前后，听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能活到三十六岁。现在，我国的平均寿命已近七十了。我今年已活到七十二岁，同三十年代相比，已多活了一倍，可以说是很幸福了。

平均寿命的昔短今长，正是新旧不同社会的一个反映。因为过去我国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生活异常困苦，生老病死都没有保障。拿我来说吧，十五岁从农村出来，到湖州美富绸厂（即美亚四厂）做学徒工。进厂前先得托人介绍；进厂时，又得填写保证书和找铺保。开始没有工资，连饭钱也要自己付，直到学会了一定的技术，才派机子给你做，工资也只有老职工的一半；以后技术熟练了，工资才逐步从六折、七折加到八折，做满三年才能与正式工一样。中间如

有病假、事假还得照补，缺一天，补一天。厂里碰到活儿忙就得加班加点，一天做十五小时，有时做到十七小时。那时对每天八小时劳动时间，连做梦也不敢想，能巴望十二小时就蛮好了。根本没有星期天，只有每月的一号、十六号算是休息日。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丝绸行业大受影响，美富绸厂关门倒闭，工人被无条件地赶出厂门，不仅不发解雇费，连路费也不给，推出了事。失业后，我走投无路，又没有路费，只好把被头、衣服送进当铺，凑了一些路费，才回到老家。在乡下依旧生活不下去，只得求人到上海找工做，先是在杨树浦一带的小厂里做临时工，几经周折，才进了美亚第六织绸厂。

日寇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资本家把“一·二八”战火中的损失转嫁到我们工人头上。一九三三年夏，资方宣布工资打九折发给。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有剥削，那里就有斗争。当时位于闸北八字桥的美亚十厂工人，在共青团员邢子陶同志领导下，发动了罢工。那时我刚参加共青团。记得邢子陶同志曾作为十厂罢工工人代表来到我们美亚六厂，号召六厂工人起来支援他们，同他们并肩斗争。由于那时六厂尚无党组织，团组织的力量也比较小，事先准备又不足，所以没有很好响应，致使十厂斗争遭到失败，邢子陶同志被开除出厂。我们六厂团支部的同志心里都很难过。大家估计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资本家很可能会向我们继续进攻。于是团支部就在本厂和其他各厂之间，加紧展开活动，组织了读书会、互助友谊会等；并领导一些局部斗争，以组织和锻炼工人，提

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坚定斗争信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厂方突然宣布：工人工资按不同工种，分别打七折到八折。美亚总厂和各分厂约四千多工人被迫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为了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在共青团组织的具体指导下，各厂都先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总罢工委员会。出版了《罢工日报》，散发了《罢工宣言》。宣言中揭露了资本家靠长期剥削工人而一天天发财的丑恶本质，引用了老工人的话：“美亚厂创办时，经理先生两脚跑，以后是坐包车（自备黄包车）、马车，而后乘小汽车，还要加上两个罗宋（流亡中国的俄国人）保镖。织绸机子由十来台变成千余台。这些财富是谁创造的？是谁的功劳？！可是我们工人的工资不但不增加，反而不断减少”。

罢工开始后，工人选出代表准备与资方谈判。先与资方约定三月十一日在总厂进行谈判。到了那天，资方却背信弃义，玩弄阴谋，一面拒绝工人提出的要求条件；一面却叫来了大批探捕便衣警察，包围了总厂，无理殴打工人纠察队员，许多工人受伤。资方的卑劣行径激怒了广大职工群众。总罢工委员会立即发表宣言，揭露资方阴谋，并组织工人宣传队、募捐队，进行宣传和募捐，以争取社会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得知上海美亚绸厂总罢工的消息，曾两次发来严禁罢工的“通令”。有蒋介石反动政府撑腰，资本家益发肆无忌惮，加紧了向工人进攻，竟贴出布告：限令工人无条件复工，拒不复工者，一律作为自动解雇，将另招新工。同时警察局和特务机关派探捕到处搜捕宣传队和募捐队人员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美亚五厂的一个工人代表被特务诱骗到厂外逮捕。

国民党特务逮捕工人代表的消息传开后，工人们极为愤慨，四千多人一齐涌向西门警察总局，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最后，在南市区各绸厂工人的大力支援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下，经过二十八小时的斗争，警察局被迫释放了工人代表。工人弟兄们沿途边喊口号，边放鞭炮，胜利回厂。

至四月十日，罢工斗争已坚持了一个多月。资方一面顽固拒绝工人的要求，一面又停闭食堂断绝工人伙食，工人生活愈益困难。在总罢委会领导下，四千多工人冒雨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去请愿，在那里耽了一夜，工人受冻挨饿，反动政府不仅没有答应解决问题，反而调遣大批警察、保安队和消防队，用高压水龙乱冲工人，用棍棒殴打工人，上百名工人被打伤，有个怀孕女工被打得流产。一批工人代表被捕，一百六十七个罢工领导者和积极分子被资方宣布开除出厂。到四月廿日，这场坚持了五十天的罢工斗争被资方勾结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了下去。

这次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广大工人在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的本质，并从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工人中一批又一批的积极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每当我们想起过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至今还会令人心酸落泪，谈起工人阶级所经历的斗争，就会使人精神振奋。老一代工人的血并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换来了工人阶级新一代的幸福。

血泪交织的工人阶级苦难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工人阶级，不论老一代还是新一代，永远不要忘记。年轻的新一代

工人，有很多长处：文化比我们年轻时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掌握新技术新工艺速度快，思想比较活跃，很少保守思想，能够较快地理解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都是可贵的。但有些青年人也有弱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波动性大，有的对政治兴趣淡薄，缺乏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态度；有的强调“向钱看”、讲实惠，工资、奖金想多拿点，工作想轻松一点，这些思想都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二是缺乏老一代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翻身感，不懂得老一辈创业的艰难。这些弱点是不难弥补的。除了党、团、工会及各组织不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外，青年同志还需要虚心地正视自己的弱点，努力学习。作为工人阶级的新一代，应该了解老一代的光荣斗争历史，明白我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懂得应该坚持的方向，继承和发扬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光荣革命传统。老一代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打了一场翻身仗，新一代的工人就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一场胜利仗。这是党的“十二大”向我们工人阶级提出的历史任务。相信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四化的斗争中，一定能够锻炼得更加坚强，一定能够接过老一代的共产主义大旗，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长征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学生运动

任 建 树

一九二九年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缓和国内人民的反抗，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白山黑水沦丧 抗日救国运动兴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东北驻军。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采取了拱手退让的政策。十九日，日军占领沈阳。二十四日，辽宁、吉林两省的重要城镇都落入敌手。东北三省的白山黑水，全部沦丧，三千多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从此过着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互通消息，把报纸中的有关报道剪贴在墙上、电线杆上。凡围观者，无不竖眉瞪眼，愤怒万分。

二十一日，复旦大学集会，师生员工四百余人慷慨宣誓：从今后，献身祖国，终身为恢复民族光荣而努力。坤范女校师生闻讯声泪俱下，臂缠黑纱，为国难致哀。二十二日，上海各界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抗日救国事宜，到会者有工商界八百余团体，五千余人，当场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接着，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各中等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相继成立。大中学校停课，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二十三日，全市下半旗，为东北死难同胞致哀。上海人

民自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的十天内，建立抗日团体四十八个，集会四十九次，发表抗日宣言或通电共一百八十二起，一致要求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国民政府电令各大学和教育厅，禁止学生罢课和请愿。人民要求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上海学生在这场反对政府投降卖国的斗争中，一马当先，站在抗日救国运动最前列。

第一次晋京请愿 驱逐日兵出境

二十三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第一次执委会发表宣言，决心“运用民众的力量，督促政府去抵抗”，並指责政府“养兵千万，临难则退缩不前，对内则残杀同胞，勇于私斗。”决定全市学生于二十六日罢课，各校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

二十五日夜十一时，大学代表五十人出发到南京请愿，提出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惩办不力外交官；发给枪枝，武装全国学生；实行革命外交，决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项要求。二十六日，蒋介石接见代表时，支支吾吾，托辞搪塞，引起学生不满。当天，上海市停工、停课，八百余团体五万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后整队游行，沿途散发抗日传单。二十八日，复旦大学千余学生到达南京，与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五千人，再次向政府请愿。蒋介石要“学生速即返校，用心读书”，拒不答复学生的正义要求。二十九日清晨，交大、暨南等十几所大学三千余学生也抵南京，重申请愿要求。蒋介石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口头上表示接受要求，说是你们“如愿从军效国，即可编入义勇军，受军事训练。”天真的学生，信以为真，当晚就回到上海。

反动当局组织义勇军是企图把蓬勃的学运“纳诸轨范”。但事态的发展却冲破了当局的“规范”。各校义勇军如雨后

春笋到处出现，到三十日报名入伍者已达五千余人。特别是马占山抵制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迎击入侵黑龙江省的日军时，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内，就为马占山募得巨款三万三千九百余元，各校义勇军自动赴东北援马抗日。而政府对马占山部，既不派兵增援，也不给予军火弹药，甚至还要取缔学生义勇军。这时学生才恍然大悟，方知受骗。

第二次晋京 迫使蒋介石亲书誓师辞

各校代表组织第二次请愿时，为了防止受骗上当，一定要蒋介石立个字据，当众亲书誓师辞。辞中写明：即日亲自率师北上，最迟不逾十二月一日。在未收复失地以前，决不回京。为达此目的，请愿学生都立下誓词：“为着热血的沸腾，抱着最大的决心，自动入京督促政府出兵，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参加这次请愿的学生，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严密。设总指挥、副总指挥、总纠察、秘书、总务部，指挥和管理请愿队伍。大队指挥部还制定纪律，要求集中行动，服从命令，要军队化等等。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五千多请愿学生分批出发，浩浩荡荡直奔南京。

国民政府对这支来势勇猛的请愿队伍，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对策，一面宣布戒严；一面“热情款待”，主动为请愿学生解决食宿问题。当场被拒绝，代表说：未得政府圆满结果时，不谈住宿。我们情愿露宿街头，饱受风霜。二十六日，请愿学生冒风顶雪伫立国府门前，终夜不散，坚持非见蒋介石不可。第二天下午，蒋介石接见代表时胡说：学生为少数人作工具。代表当即驳斥：“此次请愿纯为救国，绝非有

少数人操纵。”经过激烈的争辩，迫使蒋介石手书：“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等语。天真的学生拿到字据，以为目的达到，第二天就返回上海。他们没有料到这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

隔了两天，蒋介石发表演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对外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奴才相，对内则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在南京遭到镇压。

公审凶手 万余学生联合示威

十二月九日上午，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和中央大学代表来到上海，向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报告示威团在南京遭受镇压的真相。会后两位代表受到阻击，许秀岑被捕。当天下午，五千余大学生包围了市政府与市长张群，捣毁了国民党市党部，强烈要求释放许秀岑，不交出凶手，决不罢休。张群迫于无奈，只得下令将公安局局长陈希曾撤职，查拿市党部委员陶百川。第二天，学生在市政府门前组织民众法庭，公审凶手，直至许秀岑获释，学生才欢呼散队。

十七日，上海、北平、济南、安徽、江苏、南京等省市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总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当请愿队伍到达国民党中央党部时，军警齐出，向学生冲击。当队伍走到中央报社门前，军警即向学生开枪，并用刺刀乱刺。学生死伤、被捕数十人。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当场身亡。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七”惨案。

第二天早晨六时，数千军警将中大（请愿学生住宿地）层层包围，开枪示威，还“以飞机翱翔天空”，士兵闯入宿

舍，强迫学生起床，並大声宣读政府决定，说什么学生为共产党利用，须立即押送回沪，如有不遵，即以暴徒论处。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同其他民众团体，举行“一二·一七”烈士追悼大会。会后抬着杨桐恒烈士的灵柩，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在南京路游行示威。一场轰轰烈烈的上海学运，一幕幕紧张热烈的斗争场面，竟以抬棺游行作为它的尾声，暂时告一段落。

迅速猛烈 来去匆匆

从“九·一八”事变到来年的一月上旬，这三个多月的上海学运象潮水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声势浩大，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未能向纵深发展，同工农相结合；他们多次使用了学运斗争的最高手段——罢课，示威，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宣传抗日，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但是斗争的方式过于单一，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即使学运本身的思想建设、组织整顿与提高的工作也未受重视；尽管每次请愿示威活动，都是有领导有组织，但从整个学运来看，却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学运中发挥了动员与组织作用的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也不过是由各大学学生代表组成的一个临时性的松散团体，学运领袖也犹如历史过客，突然出现，随即销声匿迹，无影无踪。来去匆匆，自生自灭，是这次学运的明显特点。

这三个月学运的上述一些特点和弱点，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的反映。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王明等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致使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工会、学联等群众团体屡遭破坏，上海工人多次受到残酷的镇压，

以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产业工人的反响还是零碎分散的。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学运。其中尤以左倾冒险主义对学运的影响最为严重。

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日本侵占东三省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不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是用革命战争的方式去“武装保卫苏联”。他们用极左的眼光去看待国内的政治活动，把学生请愿活动看作是向国民党屈膝投降。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上海党组织不仅不能积极领导群众的抗日团体，反而对它采取了排斥、搞垮的错误态度。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只有他们组织的团体才是真正抗日的。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名称，当时都冠以“抗日”两字，只有他们直接领导的“反日民众救国”团体才冠以“反日”两字，当这个团体成立的时候，党内有不少同志主张可以叫做“抗日民众救国会”。他们认为“抗日”团体是资产阶级的，是御用性质的。为了“反日”与“抗日”一字之差，党内竟然争论不休。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由左倾冒险主义者导演了一幕滑稽剧：一群学生和工人冲散了上海最大的抗日团体——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会议，占领了会场。然后宣布：“‘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管理权移交给人民了。”

事隔四年之后，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上海学生才以崭新的革命姿态，又一次出现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高潮。



忆秦鸿钧烈士

韩慧如

秦鸿钧同志是我的丈夫，于解放前夕壮烈牺牲。鸿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鸿钧于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的一个贫农家庭，自幼丧父，家境贫困。在他十岁那年，由乡亲们资助，才上了小学。为了糊口，四年后，他中途辍学，到地主家做苦工。开始，他不懂得穷人为什么会受苦。后来，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下，逐渐明白了阶级剥削的道理。于一九二六年入团，一九二七年入党，在当地参加了农民协会，进行地下活动。一九三一年，由于家乡斗争环境十分恶劣，鸿钧被迫转移到青岛。到了青岛后，他同党失去了联系。在这段时期里，他的生活非常困苦，一面当临时工、清洁工；一面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他从青岛辗转到大连、哈尔滨，四年后，终于在哈尔滨找到了党。一九三五年党送他去苏联学习。组织上安排他学习收发电报技术，他文化低，遇到了很大困难，就早起晚睡，刻苦学习，进步很快。

一九三七年鸿钧学习期满回国，受党组织指示，到上海

搞秘密电讯工作，这年我同鸿钧结了婚。一九四〇年，他再赴苏联，进修电讯技术。一九四二年又回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为了便于工作，鸿钧开了一爿糖果店，以店主身份作掩护。在制造电台零件时，许多电讯零件没处买，也不敢公开到商店里买，他只得到旧货摊买旧料，自己制造，终于装好了一架收发报电台。鸿钧工作时由我来警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立即通知他做好撤离准备。那时我才26岁，还未入党。当时环境很险恶，街上过往车辆很多，说不定哪辆车就是来抓我们的。他白天当“老板”，晚上收发报，常常一干一个通宵。我们当时住在花园洋房三层楼，邻居都是阔太太、贵小姐，我很看不惯，他就劝我要适应环境。关于收发电报的内容，他从来不告诉我，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有一天夜晚，他收完电报后告诉我，领导上指示我们去哈尔滨接受新任务。那时去东北，要搞到“入国证”方能动身，并且事先要填一张表，姓啥干啥为啥去东北都要填。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他就以失业到哈尔滨找工作为借口填了表。他又想，直接去哈尔滨，车费贵，失业者不可能有很多钱买车票，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准备先到青岛，再到大连，最后到哈尔滨，这样和闯关东的人混在一起，不易被人注意。鸿钧发报工作需要一本精装的外文书，平时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为了免遭敌人发觉，他叫我买几张小孩鞋花样，用这本书做夹子。鸿钧还为我刻了“秦韩氏”新图章，並把它磨旧，尽量使敌人少生怀疑。动身前我们对好口径。到了青岛，领了“入国证”。八月乘上日本船坐底舱去大连。半路上，我晕船晕得很厉害，直想呕吐，那时在日本人船上呕吐会引起很

大麻烦：轻则送回青岛隔离，重则性命难保（烧身）。鸿钧要我坚持不吐。好不容易到了大连，敌人把乘客们的“入国证”都拿去检查，发还时，我们的“入国证”没还。下午上岸后，鸿钧被带到日本人那里。傍晚，又把我和小孩叫到一块。日本人问：你们为什么工作没找到，就全家出来了呢（一般是男人先找好工作，再带家属）？鸿钧对敌人说：“我们一家人死要死在一起。”敌人又搜我们的身，并把那本外文书翻了很久，叽哩呱啦嘟囔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我们关了起来。这时有人提醒我们，花点钱疏通一下，日本人问我们在大连有熟人没有，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我们就说没有。为了争取尽早释放，以利工作，鸿钧就对敌人说：“老婆孩子留下，我出去想想办法”。敌人同意了。于是，他就找到了堂侄，堂侄虽然没钱，但他用日语向日本人担保，答应今后交钱，这样，我们才被放出来。到了侄子家，住在马棚里，半夜里孩子被马蜂咬得直哭，我很伤心，悲从中来。他问我：“你搞革命有没有决心？敢不敢献身？你刚碰到小困难就受不了，还行吗？”听了他的话，我的怨气一下子都消失了。在大连住了一段时间，发现敌人没盯我们的梢，就动身到了哈尔滨，找到一个同志（杂粮店老板）接上了头，鸿钧在店里当学徒，我又成了学徒家属。在农村租了一间小草房住下来后，鸿钧立即交给我三项任务：一、尽快学习农村妇女的装扮和生活习惯；二、照学徒生活水平安排生活；三、打扫大院，和邻居搞好关系。他在外面买了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我责怪他说：“一样花钱，为什么不买两把椅子？”他说：“你看周围邻居谁家桌子旁边放椅子。”从这些小事上，处处可以看出鸿钧警惕性是很高的。记得刚开